

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21.01.004

历史解释与历史重演

——重塑《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庄公的形象

张懿奕

(北京化工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是非常著名的历史叙述文本,讲述了庄公兄弟二人为王位而反目成仇的过程。《左传》评价“兄不友、弟不恭”的伦常失序是事件的起因。后世评论多以此为据,而忽视兄弟二人的母亲武姜的政治力量。清华简第六辑《郑武夫人规孺子》,塑造出颇具政治谋略的武姜,综合《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叙述,借助历史重演解释理论分析可知,她与庄公多年秘而不宣的政治角力,是郑伯克段叙述中的内隐的政治背景。庄公借助边父、祭仲等人的长久筹谋,因势利导,驱逐共叔段、拘禁武姜,避免郑国内乱,为国家兴盛谋求发展空间,但他养骄长恶,一贯以满足个体私欲来豢养王室及其近属,为郑国埋下内乱的祸根。

关键词: 历史解释;历史叙述;历史重演;武姜;庄公

中图分类号: I207.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21)01-0026-10

2016 年清华竹简《系年·第六辑》出版问世后,其中涉及春秋时期郑国早期的一段历史往事《郑武夫人规孺子》,发生在郑国武公去世到郑庄公继位之前,早于“郑伯克段于鄢”事件,它为我们重新理解庄公、武姜和共叔段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契机。结合这段新史料,与《左传》论述可知,庄公克段,并非是个人的决策结果,而是经过群策群议,仔细考虑郑国所处的复杂境况之后,做出的决定。与以往认为庄公形象或是“深谋远虑”,或是“伪善”,或是兼具谋虑与仁心,有所区别。新材料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郑国顶层政治的决策过程,国君和本国贵族卿士集团共同做出,意见不同时,用占卜决定^[1]。因此当出兵克段的命令下达时,未见占卜记载,说明庄公与卿士集团已达成一致。

重塑庄公形象依据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是通过人物及其活动显露出来。这种历史事实既有人类历史的全部客观过程,也有被书写的历史事实。被书写的历史事实,也是包含一定共识的和确切证据

的历史事实。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沃尔什(W. H. Walsh)说:“一个历史学家所印证的事实如果确切可信的话,就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他个人的所有物,倒不如说是每一个有理智的人如果进行调查的话,都必须同意的那种东西。”^[2]客观的历史事实必须经过历史学家的挖掘和整理才能为人所知,但书写的史实确实应包含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史记·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深切著名焉。’”^①在表述中,大量的潜文本信息被隐藏在书写史实中,潜文本信息铸造出更细密翔实的人物生存图景,对后人理解历史人物的行动意图、抉择缘由,乃至重新评价历史人物,提供多一种可能。

“郑伯克段于鄢”的历史叙述有着鲜明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首先,这个故事的叙事相对完整,在一个叙述年中,展现整个事件的起承转合;其次,郑庄公身上体现着宣扬以德治国和隐藏保卫自己(或本族、本国)之间的言、行矛盾,或者表现为他追求私利(本国利益)与仪礼约束之间的张力;再次,事件

收稿日期:2020-12-16

作者简介:张懿奕(1983—),女,北京人,博士,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早期叙事文学研究。

① 参见:(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228.无论是先秦史官或者孔子本人,对史事尤为看重。简洁的上古历史叙述中隐藏着诸多揭示具体事件环境的潜文本,借助文献间的对比、互证,更充分明了历史情景与人物行事的因由。

本身还体现着春秋贵族家庭与王国之间复杂的联动关系,尤其表现在嫡长子继承的问题中,对权力的捍卫、对血缘手足的打击等。运用历史解释的重演和实践推断原则,借助《左传》、清华《竹简》叙述,深入由行为、语言、政治秩序等观念熔铸的潜文本信息中,归纳人物行为产生的环境动机、相关意图,建构合乎逻辑的行动链接,重塑庄公形象。

一、作为历史解释文本的《春秋》与《左传》

英国历史学者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认为历史解释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解释。自然科学的解释是一种普遍化解释,它倾向于分类和一般规律的使用,而历史学的解释是一种重演解释,它倾向于深入事件的内部,而理解历史事件。历史重演解释是指历史学家通过洞察历史行动者的思想并想象他自己参与某个理性行动,他就理解了那个行动;而以一种叙述方式表达了这种重演之后,历史学家也就完成了对这一行动的解释,此时的解释和理解是同一的^[3]。任何关于对历史的叙述、记载都是一种重演解释活动,史官记史如此,解释史书亦如此。

传统观点认为孔子晚年返鲁之后,开始依据鲁国旧史《春秋》及其他诸侯国赴鲁的“国史”而“述作”《春秋》。自“古史辨”派之后,学界普遍接受孔子并没有“作”《春秋》。杨伯峻先生认为孔子很有可能将《春秋》作为自己教育弟子的教材,从讲述过去的历史中,阐发自己的思想。无论孔子与《春秋》是否密切关联,这部《春秋》也很难被划为“史”的范畴,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记录“不客观”^{[4]8}。精通上古史的历史学家傅斯年认为“不客观”的原因是:《春秋》本为鲁国的旧国史,记录的是贵族之事,而贵族从西周开始就是少数人的社会,有着他们自己的舆论和标准,况且当时的书写材料很缺乏,因此造就了《春秋》这种别样的文体样式,这大概是《春秋》

史记又笔削的由来^[5]。即使孔子或孔子后世借原文自寄其笔削之意,也是依据《春秋》本事,顺势而为。王安石讥讽《春秋》为“断乱朝报”,鲁史纪年肯定不是从隐公开始,也不是以哀公作为结束,但《春秋》载事从东迁的平王,补弑的隐公,终结在获麟或者孔丘卒,自成一个始终。如果以朝报看,确实断烂,但如果将它视为西周伦理道德实践的记载,那么它确实是有头有尾的。这种独特的记录体式,后世将《春秋》作为经部的一个单独目录,提醒研究者关注的并不是孔子是否写过《春秋》,而是隐藏于《春秋》简约隐晦文字中的“微言大义”是否是孔子思想。

孔子即歿,“儒分为八”,弟子对《春秋》内容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解释。无论是《春秋》还是《春秋》三传都是在借助阐释历史、解释历史发明《春秋》经义。在中国早期,但凡具备叙述历史能力的人,都可视为历史学家。孔子是历史学家,记录西周历史的各国史官是历史学家,《左传》的叙述者们是历史学家^①,也是历史的解释者。

历史重演是历史解释者通过重新描述历史人物的行为,以相对客观、中立地看待历史的叙述。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叙述是重演历史的阐释活动,重演阐释是从行动者的处境开始的。历史解释者考虑行动者(历史人物)所面对的处境和他如何设想这种处境,以及他倾向于对这种处境做出如何反应,被称为“处境动机”(causa quod)^②。从这种对处境、对行动者处境动机的陈述中,历史解释者要为自己想象历史人物所面临的处境,要为自己思考历史人物在那种处境下是如何考虑实施应对它所可能的采取的办法^③。解释者所要做的工作是建立起构成行动者行为的两个因素:即他的处境动机和他的意图,而且指出这两个特征是连贯地组合起来的。即表明行动者的意图是对他的处境动机的反应^④。重演解释理论

① 《左传》是古代注家对古本的不断解释和阐发而层累地形成的,其目的都是借助叙述历史事件而申明大义。

② 处境动机概念的提出,详见:[美]雷克斯·马丁.历史解释:重演和实践推断[M].王晓红,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61.

③ 历史叙述基于特定、具体的历史语境。详见:[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增补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15.

④ 加登纳转引了柯林伍德在《形而上学》对处境动机和意图的限定说明:行动的原因是“由两个因素组成的,处境动机和意图。处境动机是事情存在的处境或者状态;意图是事情带来的目的或状态。只确定一者,将无法构成原因。……意图不是一个单纯的嗜欲或者愿望,它是一个意向。一个人以某种方式行动的意图并不是他想以那种方式行动,而是他想以哪种方式行动。”参见:[英]加登纳.历史解释的性质[M].江怡,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80.

是这样建构的:首先,从了解行为者的处境开始,叙述具有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随着解释者更多地理解行动者的思想,对原因的描述就变得越来越确定了。当解释者将行动者考虑的处境动机和他的意图或者目的联合起来考察时,对行动者的思想特征的概述就完成了。马丁(Rex Martin)对柯林伍德关于

这两个特征还有补充,提出对行动者思想的相关意向——他的顾虑、他的行动技能等,在解释的评估中也需要考虑^[6]。这三者实际构成了一种三角形图式(见图1),形象说明历史解释者进行重演解释的三个关键点,有助于解释者综合考量行动者的处境动机、相关意图、完成行为等因素,审视的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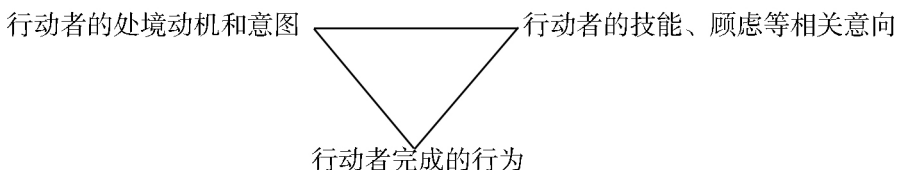


图1 重演解释的三角形图式^①

由这个图式可知,行动者觉察到自己处于某种劣势情景,由此触发他产生摆脱劣势的处境动机。随着危机日益加深,行动者越来越趋向选择某种方法尽力脱困的意图。这种意图越强烈,就越能驱使行动者以最擅长的行为、最小的代价,解决危机,由此展开自救行动。

二、“郑伯克段于鄢”的重演和实践推断

上述的三角形图谱是如何在“郑伯克段于鄢”的事件中发生作用,下文结合《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叙述予以说明: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

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絜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

① 马丁引用了一个“有效前提”的概念,理清柯氏的表述。历史学家如果对历史人物某个公开行动进行行为演绎,并尝试进行思想解释,那么需要对行动者的实际处境首先做一个说明——有效前提。有效前提往往是指行动者的行动技能,以保证其实施具体行动。重演解释被描述为:促使行动者去行动的动力总来自他对于处境的察知,而决定行动成功与否,或者甚至是否能够引发其行动发生的却是实际处境中的那些事实。实际处境有时参照其他人正在想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来描述,有时是参照自然界的某种物理事实。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实际的处境都是存在的;它是行动者行动的“原材料”,而且有自身的“影响”。参见:[美]雷克斯·马丁.历史解释:重演和实践推断[M].王晓红,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78.

“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4]9-14}

《左传》这段文字是为解释《春秋》经文“郑伯克段于鄢”。整段叙述浓缩了四十年的时间,从郑武公与武姜成婚开始直到庄公继位的第22年,段被赶出郑国而停止。文末叙述方式从暗示变为直接的判断,由“书曰”一词引出,以“君子曰”结束全文,是《左传》解经的标志之一。通常认为,“书曰”阐释君子曰对庄公的谴责原因:君子批评庄公未能尽到兄长之责,纵容段不断膨胀的私欲,而导致兄弟阋墙、兵戎相见的国家内战。“君子曰”的文字赞赏颍考叔的“纯孝”,暗贬庄公掺杂政治因素的“伪孝”。庄公虽然挫败了共叔段谋逆的阴谋,却被“君子”谴责为:不悌、不孝。

《左传》君子曰、书曰的评论文字,将君主的个人的品性养成与国家政治的谋断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涉及界定政权的枢纽、维持公族嫡系和庶系的平衡、寻求政治道德和家庭伦理道德重合的可能。就这段历史而言,历史解释者们提供了至少五种不同含义的解读。

第一种是《将仲子·毛诗序》:

将仲子刺庄公。不胜其母,以害其弟。
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
小不忍以致大乱^[7]。

假设潜文本信息与字面叙述表里如一,按照“君子曰”与引《诗》理解故事:不驯服的弟弟最终被哥哥制服,母子矛盾公开和解。家国由分而合,解决了家庭伦理矛盾,就化解了分裂。

第二种是《左传》“书曰”的评价,谴责郑庄公的不孝与不悌:庄公蓄意煽动段谋反,设计自己的亲弟弟成为叛国罪人。

第三种读法是兼有上述二者的结合体,如清代学者毛奇龄认为庄公对段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听从从母亲的要求^[8]。在段发动叛乱前,他也没掌握确凿的叛乱证据,无法采取有效的遏制,而他容忍段逃到共地并生存下来,正是显示了作为兄长的宽容与大度,《春秋》对郑庄公的遭遇实际是同情的,对他的态度从谴责转到和解。上述三种读法称赞孝和悌的美德,并认为它具有教化意义。

第四种读法是与上述读法截然相反。大部分《左传》注家,如杜预等则视郑庄公是老练的政治阴谋家^{[9]6}。他处心积虑成功地镇压了弟弟段的叛乱,又为自己在道德上找到了合理的说辞。

承接这四种读法延伸思考,海外历史学家有了新的读法,即第五种读法:《左传》文本叙述者实际更着眼于实际的政治现实和政治谋略,用“道德垂戒”的话语策略,将对权势的实践和表面道德的言辞统一起来。从而使得“垂戒”变得冠冕堂皇而沦为谋求实际利益的工具,这是第五种解读策略^①。这五种解读策略实际在指向君王的修养功夫与国家政治决策间的联动关系。

借助历史重演图谱模型,郑伯克段于鄢的历史解析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郑伯克段”;二是“掘地见母”。构成这两个部分的叙事因素有6个:郑庄公(个人性格与道德修养)、共叔段、武姜、祭仲等谋略大臣、记录史事的史官、君子。庄公的行动选择需考虑:他与共叔段的关系、与武姜的关系、与祭仲等政治谋虑集团的关系,其中祭仲等贵族构成政治谋虑集团包括:祭仲等贵族卿士,也包括记录此事的史官,这里面涉及春秋早期时代的血缘关系构成的贵族集团,还不允许非贵族血统的人进入,这就解释了颍考叔会被子都暗箭射杀而郑庄公并不惩罚的原因^②。影响解释的叙述因素有:史官的叙述和君子曰的评论导向。君子曰的评论带有明显的道德评价,与史官叙述不同,可能为后世解释者添加^③。因

① 美国历史学家李慧仪通过重译《左传》,深入挖掘历史表述中隐藏的未被注意但又对历史事件有关键影响的细节。参见:〔美〕李慧仪.《左传》的书写与解读[M]. 文韬,许明德,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9.

② 《左传·隐公十一年》叙述颍考叔之死。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8:63.

③ 王和通过考察《左传》成书过程,认为《左传》原貌可能是一部独立的史事汇编,经师们将它作为讲解《春秋》的辅导材料,在讲解中陆续添加了一些解经的话,“君子曰”很可能就是经师附益的内容。王和.《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83.

此,在“郑伯克段于鄢”的历史中,郑庄公的形象是在历史重演、后世解释的层累中构筑的。

1. “郑伯克段”的历史重演和实践推断

庄公的言辞与行为是处心积虑消除异己的政治表演,还是单纯的被动的保卫自己的自救行为,下文运用历史重演理论的逻辑推演过程,分步骤详细分析庄公的环境动机、有关意图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重演“郑伯克段于鄢”的历史往事,以寻求解答。

(1)行动者觉察到自己所在的特定环境,并且针对这个处境倾向于以某种明确的方式行动^①。

郑庄公采取的行动是,命令子封出兵阻击偷袭的公子段,并将公子段赶出郑国。“公闻其期,曰:可矣”的描述清楚表明,郑庄公已经知道公子段将在母亲姜氏的指引下,要偷偷入侵郑国国都新郑,发动叛乱,夺取王位。他果断地命令子封出兵保卫新郑。郑庄公的特定环境是新郑将被包围,王位将被获取,他针对这种倾向采取的明确行动方式是出兵迎敌,准备战斗。

(2)对在(1)中描述的行动者的处境动机,有许多可供选择的行动过程(指定A——例如,入侵B、C等等)是行动者愿意考虑的。

郑庄公的处境动机是保卫郑国的都城新郑,保卫自己的王位,那么除了出兵之外,是否有其他别的方法消除这一威胁?祭仲等谋士分别报告了公子段有夺取王国的迹象和野心,比如祭仲告诉郑庄公,段的属地京城的城墙面积已经高过百雉,远超规制;公子吕先后稟报段又将边境的四个城池划归到自己的属地。但郑庄公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措施,只是在言辞上表示:如果段多行不义,必自毙,将惩罚权交给上天。如果郑庄公为阴谋家的话,庄公此时暗中部署,静待段“入瓮”。

新出土的史料清华竹简曾记载郑国的决策过程,实际提出了另外的历史背景:

邦将有大事,必再三进大夫而与之偕

图。既得图乃为之毁,图所贤者焉,申之以龟筮。^{[10]117}

国之大事,谋划应慎重,提出意见之后,需征询卿大夫集团的意见,选出最优策略。可见,郑庄公对段采取的“再三等待”,并不是“请君入瓮”,而是他和他的谋士们都采取“观望”态度,并隐含暗中部署之意。比如密切关注母亲姜氏和段的动向。庄公军队能快速而有效地打败偷袭之军,原因是他们做好了防御准备,因此根据上述史料判断,国君的决策是共同商议之后呈现的,庄公何时下令出兵,自然也是群谋群策群议之后的选择,而非他个人主观决定。需要注意的是,庄公及其卿士们出兵前不曾“申之以卜筮”,说明他们有“依礼出兵”而防御成功的绝对信心。

(3)行动者确实想达到或者完成这样的目的,如征服,他相信这个目的将符合他的处境动机。

庄公在鄢地打败段之后,消灭了段大部分军事力量,而且段的属地——京的子民已经抛弃了段,段即使回到属地,也没有可能在继续纠结力量反击,所以他只能逃向他国。庄公很有可能在克段之前,先策反京人,否则京人不可能在段刚战败就如此迅速地投靠庄公。这样庄公才命令子封不用追杀段,任由他逃到他国“糊口于四方”^②。

(4)在所描述的过程中,行动者相信行动A是完成或者部分地达到他所宣称的意图的一种方法。

(5)除了A,行动者不相信或者没有看到其他行动是优先达到其目的的一种方法,或甚至没有将其看作是可以达到其目的的一种方法。

除了密切监控部署防御,并在必要时采取防御反击之外,庄公是不是就没有其他选择呢?或者说为什么庄公和他的决策者们要“等待段将袭郑”?因为是“夫人将启之”。庄公此刻已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母亲

① 下文所列(1)一(7)条目,均来自《重演的历史》,参见:[美]雷克斯·马丁.历史解释:重演和实践推断[M].王晓红,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74.故不再重复注释。

② 《左传·隐公十一年》:(郑庄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口于四方。”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63.

姜氏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让弟弟段继承郑国王位。

综合《郑伯克段于鄢》《郑武夫人规孺子》的叙述,庄公成长有两条叙事线索并行,都制约着庄公的相关意图和行动结果。一条线索是庄公与母亲姜氏、胞弟段之间的关系。另一条线索是庄公与父亲郑武公及郑国卿士集团的关系。新出土的清华竹简《郑武夫人规孺子》对于上述分析提供了史料支撑^①。

所谓“孺子”实际就是还没有长大的储君寤生。寤生十四岁时,父亲郑武公去世了,武姜为了不让寤生继位,而精心准备了一番说辞,李守奎先生认为此篇内容是武姜对嗣君的规辞,由三方面内容构成了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②。

首先她向嗣君(孺子寤生)追述了先君武公的往事,武公曾陷于大难,被迫居住在卫国,而郑国三年无君,良臣执国政,国家未曾动乱,良臣有功,先君用人有方。武姜用历史经验告诉寤生:国家有良臣执政,可以三年无君。

吾君陷于大难之中,居于卫三年,不见其邦,亦不见其室,如无有良臣,三年无君,邦家乱矣。自卫与郑,若卑耳而谋。^{[10]118}

其次对嗣君(孺子寤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母子双方谁也不能利用个人力量干涉大夫执政。

今吾君即世,孺子汝毋知邦政,属之大夫,老妇亦将纠修宫中之政,门坎之外毋敢有知焉。^{[10]119}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武姜给出了她的理由:

孺子汝恭大夫且以教(学)焉。如及三岁,幸果善之,孺子其重得良臣,使御寇也,布图于君。昔吾先君使二三臣,抑早前后之以言,使群臣得执焉,……臣,四邻以吾先君为能叙。如弗果善,吾先君而孤孺子,其臯亦足数也。邦人既尽闻之,孺子或

延告吾先君。如忍(认)孺子之志,亦犹足,吾先君必将相孺子以定郑邦之社稷。^{[10]119}

寤生年纪尚小理应向良臣多学习,这是理由一;理由二是无论大夫三年执政的结果如何,只会对嗣君有利:大夫执政成功,嗣君得到稳定的国家,忠心得力的良臣以辅佐御寇,如果执政不利,罪责也在大夫;理由三是大夫之罪昭然天下,嗣君向先君亡灵求告时,也会得到先君的保佑。

这三个理由显示出武姜的精密的政治谋断,成功地劝阻庄公顺利登基执政。根据《史记·郑世家》记载,郑武公去世时,寤生十四岁,只好遵从母命,把政权交给大臣。

孺子拜,乃皆临。自是期以至葬日,孺子毋敢有知焉,属之大夫及百执事人,皆惧,各恭其事。^{[11]119}

武姜在武公去世之后,掌控大局,分配权利,规正孺子之后,才行临礼。说明她并未沉浸在临丧之哀,而是更关心如何控制局面,不但延缓了下葬的日期,还要求嗣君三年内不得主政,为段筹谋王位争取更多的时间。这与《左传》中武姜对寤生的态度是一致的: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4]9}

同时参考《史记·郑世家》中的描述: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请公,欲立段为太子,公弗听。是岁,武公卒,寤生立,是为庄公^[11]。

寤生因为难产导致姜氏的厌恶,姜氏宠爱段,厌

① 《郑武夫人规孺子》的写作时间,据李守奎先生推断为庄公在世期间,是史官实录。“此篇所载的内容”“郑武公居卫三年”时郑国的国家决策情况,为周代诸侯国的顶层决策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例证,其意义对于研究春秋初郑国的历史,尤其对于了解武公去世后围绕嗣君问题展开的权利斗争颇具史料价值。晁福林.谈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的史料价值[J].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25.

② 本文借助李守奎先生对史料的解读,说明武姜在嗣君问题上体现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让庄公从小就忌惮她。这也正是庄公一再隐忍武姜种种不合“礼”行为的重要原因。李守奎.《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丧礼用语与相关的礼制问题[J].中国史研究,2016,11(1):11-18.

恶庄公,甚至到了要求“废长立幼”的地步。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纽带的西周礼制中,君王身故是王权更替的主要原因。一旦段成为郑国继任君主,庄公只能被杀或不断逃亡躲避被杀,或在他国的帮助下杀死段重夺君位。宋觞公在位十年,与郑国发生十一次战争,就是因为郑国接纳并打算拥立宋国既定继承人公子冯。

母亲废长立幼的请求,说明在父亲郑武公在位期间,母亲武姜对庄公厌恶到极点。庄公断然拒绝母亲姜氏的要求,姜氏可以凭“不孝”的名义,动用政治力量,杀死庄公,从而立段为郑国的新国君。所以母亲姜氏实际是庄公最大的威胁。当庄公采取行动前,必须考虑到姜氏的政治力量。当段不断侵吞庄公的属地,祭仲向庄公要求尽早图之,勿使蔓草滋生,庄公回应为“姜氏之欲,焉辟害”。说明庄公忌惮的仍然是母亲姜氏的力量。段远在京邑,母亲姜氏作为段的内应,为段寻找偷袭的时机。“公闻其期,曰‘可以’”。这个日期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母亲姜氏为段传递消息的日期,二是段准备发动袭击的日子。

叙述中并行出现的另一条线索,是郑武公及其执事大夫对庄公的保护与教育。母亲姜氏多次要求立段为太子,都被郑武公断然拒绝,既是对礼制的维护,又是对幼年寤生的保护。清华简记述当时武公去世,孺子接受武姜规训不参与任何国事决定,执事大臣责任重大,作为执事大臣的首领边父劝诫其他大夫首要任务是完成安葬之礼。

君拱而不言,加重于大夫,汝慎君葬,
而旧(久)之于上三月^{[10]118}。

据李学勤和李守奎对简牍文字的判读,“久之于上三月”理解为在礼制五个月之外再加三月甚至更久。这有可能就是武姜的意愿。

一年过去,小祥之后,国君依旧不言。按礼制规定,诸侯下葬之后,嗣君即可主政。因此大夫聚谋,使边父于君,说出大臣们的隐忧,希望庄公能尽早执政,否则“岂既臣之获罪,又辱没吾先君!”

在这场太后与嗣君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以边父为首的大臣似乎是忠诚与礼制和武公意愿,拥戴嗣君。日后庄公执政,祭仲等一千大夫多次向庄公进谏,要求早除武姜和段,这两段叙述可以互相说明。

(6)没有其他意图压倒行动者要如此这般实现的意图。

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最后一段叙述了嗣君以继续为先君守丧为由拒绝边父请其立即执政。

嗣君回答边父:“父曰:二三大夫,不当毋然。二三大夫皆吾先君之所付(由)孙也。吾先君知二三子之不二心,用(兼)授之邦。不是然,或称起吾先君于大难之中?今二三大夫畜孤而作焉,几孤其足为免(勉),抑无如吾先君之忧何!”^{[10]118}

庄公表示:诸位大臣都是先君信任的人,先君知道你们没有二心,所以放心让你们执政,如果你们不堪大任,谁还能让先君振兴在大难之中。现在你们希望我有所作为,或许我能努力而为,但是我还是先要为先君守丧。此时的嗣君一定要在十分合理的“正名”的情况中,才有所行动。结合后文他对段的意图,可以明了这一点。只要段没有明确的进军行动,庄公应该是会一直处于戒备状态。但只要段起兵偷袭,那他也只能用武力自保。

(7)行动者知道如何去做A,行动者的身体条件能够做A,在特定的处境中能够将去做,有机会去做,等等。

庄公出生时据说是脚先出来,得名“寤生”,与一般的生产顺序相反,因而被母亲姜氏视为不祥而极端厌恶。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孩子还依然能存活下来并继位成为君王,说明他生命的坚韧与顽强,且精力充沛能够采取任何行动。

综上所述,首先考虑行动者本身的条件,从生理、心理到性格,这些构成了行动的前提。《左传》中行动者采取行动的前提有三个:一是行动者的性格,这种性格往往与国家、个人命运相联系,行动者的鲁莽、傲慢自大、放纵不羁、不听劝阻、一意孤行等,都将导致行动者判断失误,轻则身故、重则亡国的结局。二是行动者所处的环境,既有家庭内部矛盾,又有支持不同家庭成员的外部政治矛盾。三是王室亲族分封地的战略意义。武姜即使在庄公执政之后,依然积极地再为段谋划。武姜第一次请求的制地,曾是东虢国的都邑,位于郑国国都新郑的北面,虎视眈眈地窥伺庄公动向,令他如芒背刺,因此庄公拒绝请制的要求。第二次是京地,是郑国曾经

的都邑,经济基础好,祖庙也在此,姜氏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段的封地在此,也可能再度成为郑国都邑。昭公十一年,楚国申无宇曾说:“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亲不在外,羈不在内。末大必折,尾大不掉。”^{[4]1365}说明君王为旁系血亲选择封地的原则就是不要让封地有扩大的可能,从而威胁到王权。

因此庄公的处境动机是保护自己的政权不被推翻,但结合他的相关意图,这一动机包括的内容就变得复杂起来:首先,他表面遵守“孝、悌”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不给武姜以废黜自己的理由。其次,部署防御措施,警惕国内谋篡力量,如胞弟段企图偷袭而获得王位。

在处境动机和相关意图的协作下,当母亲武姜作为内应引导胞弟段偷袭庄公时,庄公只是简单向子封发出了指令“可矣”,将段赶出了郑国。《左传》叙述此事只用了50个字。但在如何处理武姜的问题上,用了200字左右。“君子”认为母子关系的破裂与和解才是关注的重点。

2. “黄泉见母”的历史重演和实践推断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4]12-14}

(1) 庄公置母城颍的前提——“克”段的实际

意图

《左传》编年叙述重在表明开端和结尾,对事件过程本身的叙述在其次。《春秋》记录“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却继续共叔段出奔之后的母子相见情况,作为本事的结局。

“书曰”叙述起到过渡作用,矛盾焦点从政权对抗转移到情理抉择。《春秋》先验庄公本意是杀段,还是逐段。《公羊传》将“克”训解为“杀”^[12];《谷梁传》将“克”视为“能杀”^[13];《左传》说:“如二君,故曰克”^{[4]14}。三传不约而同将庄公与段视为政权对立双方,而非血缘兄弟。对待图谋篡逆者,《公羊传》《谷梁传》用“杀”“能杀”,即“克”,《左传》运用“郑志”来揭示“克”。事情的进展按庄公及其谋略集团的计划进行,他们是事件的最终掌握人^①。庄公应该“杀弟”还是“逐弟”,需要进一步分析。杜预认为:“克”字表示“明郑伯志在必杀,难言其奔”^{[9]5}。这是解释“书曰”中“不言出奔,难之也”,如果说段逃离出奔,那么承担此事就只有共叔段一个人,而让庄公无咎。这显然与责备庄公的《春秋》之意相去甚远。“难”字有责难的意思,责备庄公在段出奔的这件事情上要负责。而明清注家看重君臣大义,对责难庄公尤为不安,为庄公辩护。如毛奇龄的出发点是以维护君父权利秩序为基础,强调防微杜渐的重要性,他说:“《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未常曰使乱君贼父惧’。”^[8]进而指出《春秋》一定是在衡量庄公的功过之后,才选择以“克”字称赞庄公,有克敌制胜的意思,而不是杀死对手。综上所述,《春秋》责难郑庄公的原因,并非在他打算逐弟或是杀弟。“书曰”文字首先肯定了庄公作为国君的卓越才能,这种才干是其胞弟段所不具备的^[14]。庄公纵容段的贪欲,明知这种贪欲将毁灭段,却袖手旁观。庄公为自保而构陷手足,这是《春秋》深责庄公之处。

随着段的出奔,庄公与武姜之间在政治上紧张的敌对关系消除了。需要解决母子二人在政治伦理上的矛盾,具体而言,是庄公如何为置自己于死地的

① 志在《左传》中有3种解释。其一理解为隐藏的意图,如此处的“郑志”、文姜与齐僖公幽会时的“齐志”、鲁国攻打邾国为“宋志”;其二的理解是众人都知晓的政治目的,如当宋国叛军控制住彭城,诸侯联军围攻时,被称为“宋志”;其三是用于“言以足志”“赋诗言志”。参见:钱钟书. 管锥编[M]. 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172-173.

母亲武姜尽孝道,而武姜又该以什么情绪面对自己最厌恶的寤生。从人性和人情看,这对母子间真情是“恨”而非“爱”,他们的目的只是“和解”而非“解决”,也就是说他们二人的矛盾也是国内政治中必须妥善处置的问题。

(2) 置母城颖——恰当的行动

段出奔共,敌对势力关系的消除,紧绷的内外政治压力也消失殆尽。庄公下一步行动是“处置”武姜。庄公令姜氏搬离王宫而置于城颖,庄公依然可以去城颖拜望母亲。既维护国君明断的政治形象,又为天下人树立“孝”的榜样。《左传》叙述“郑伯克段于鄢”一事至此就应该结束。

庄公激动发下绝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准备彻底断绝母子关系。显然庄公并未考虑说出这句誓言带来严重后果。后文用“既而悔之”这四个字,表明庄公意识到此话的不妥但却无计可施,叙述将再起波澜^[15]。他的冲动、后悔、尴尬与被动,与前番沉着善谋形成强烈反差。

(3) 黄泉见母——冲动行为的挽救措施

“既而悔之”庄公第三个行动的动机。“君子曰”之语称赞“纯孝”产生的强大的感召力,使得边境小吏颖考叔具备解困的超凡智慧。他引譬连类将黄泉水与地下水等同置换,先化解由语言危机招致的行动危机,再修建通往地下的隧道,庄公见母尽孝。母子二人在隧道内外赋诗,和好如初,昭告天下。

但后世的注家怀疑道德感化的力量,认为“孝”是借口,政治智慧与道德修养无关,日本学者竹添光鸿认为庄公与其母的和解是口是心非的证据,他指出:“颖考叔固非孝子,庄公亦非孝感之人,君臣讥诈相投,以欺一世。而君子之论如此何也。古人宽于责恶,而急于劝善,故一有改恶迁善之举,则录其见行,而略其隐衷,忠厚待人之道使然也”^[16]。竹添光鸿以反讽之语强调崇尚权力、维护政权稳定是庄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

推敲庄公与其母的和解过程,是灵活地使用连类譬喻的修辞,并无真心。他先发誓与母亲“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最后以“阙地及泉”置换“黄泉相见”,达成和解。庄公作为一国之主,国君的誓词众所皆知,“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令庄公陷入了困境。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诡辩”,即模糊语义

产生的环境,实现词语的置换。从这个角度看,叙述者对颖考叔的称赞就不只是因为颖考叔的“为母奉食的孝行”,而是为庄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颖考叔巧妙地运用词义以达成多重的连类引譬,并营造政治奇观秀——掘地及泉和公开表演——母子二人分别在隧道内外赋诗的重要性,这些行为有效地向国人展示出庄公的孝心,所以《左传》评论说:“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

三、结语

从前文叙述分析可知《左传》的历史叙述重在道德垂训层面,但道德垂训又与巩固和维护政权的稳定、统一息息相关。《左传》叙述者以“孝、悌”的道德标准统摄全局展开叙述,省略或隐藏了继承王位而引发的王室内部残酷的活命竞争。郑庄公贵为国君,面临段与姜氏篡位夺权的阴谋,并没有坚守“君子固穷”的高贵品格,而选择“小人穷斯滥矣”的策略,借段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使他走向自取灭亡之路。郑庄公保住性命与王位,解除内乱危机,维护了郑国的稳定。但他自克段开始养骄长恶的习惯性行为,为满足个体私欲豢养王室及近属,在他去世后,爆发了持续数十年之久的昭厉之乱,郑国国运由盛至衰,过早退出了争霸盟主的历史舞台。重演历史人物的行动轨迹,揭示春秋时期上位者的生存之术,从而将惩恶扬善的道德教化落实在历史人物的抉择图景中。

参考文献:

- [1] 晁福林. 谈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的史料价值[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7): 12.
- [2] [英] 沃尔什. 历史哲学导论[M]. 何兆武, 张文杰,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8.
- [3] [英] 柯林伍德. 历史的观念[M]. 增补版. 何兆武, 张文杰, 陈新,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79.
- [4]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5] 傅斯年. 史学方法导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32.
- [6] [英] 雷克斯·马丁. 历史解释: 重演和实践推断[M]. 王晓红, 译.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05: 80.
- [7] (清) 阮元, 校刻.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711.
- [8] (清) 毛奇龄. 春秋毛氏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23-25.

[9](晋)杜 预. 春秋左传集解[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10:37.

[10]李学勤.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六册[M]. 上海:中西书局,2016.

[11]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13:278.

[12]王维堤,唐书文. 春秋公羊传译注[M]//十三经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6.

[13]承 载. 春秋穀梁传译注[M]//十三经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5.

[14]白国红. 《春秋》“郑伯克段于鄢”史事新论——以共叔段为中心的考察[J].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0(2): 34-38.

[15](清)吴恺生. 左传微[M]. 合肥:黄山书社,2014:7.

[16][日]竹添光鸿. 左氏会笺[M]. 成都:巴蜀书社,2008: 30.

Historical Explanation and Historical Re – enactment : Reshaping

the Image of Duke Zhuang in the First Year of Duke Yin’s Time (722 BC)

ZHANG Yi – y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Duke Zhuang defeated his younger brother Gong Shuduan” is a very famous historical narrative text in *Tso Chuan*, which tells the process of Duke Zhuang and his brother who became enemies for the throne. In the book *Tso Chuan*, the moral deficiency that “the elder brother did not fulfill his responsibility to discipline his younger brother, and the younger brother did not know that he should respect his elder brother” was the cause of the incident. Later generations based their comments mainly on *Tso Chuan* and ignore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Wu Jiang, the mother of two brothers. The sixth series of Tsinghua Bamboo Slips, *Madame Zheng Wu’s Rules*, created Wu Jiang who was accomplished in political strategy . Synthesizing the narrative of *Tso Chuan* and making analysis with the historical reenactment theory, it can be seen that her years of secret political battle with Duke Zhuang was the implicit political context in the narrative, With the help of Bianfu, Jizhong and others’ long – term planning, he (Duke Zhuang) made good use of the situation, expelled Gong Shuduan and imprisoned Wu Jiang, avoiding civil strife and seeking development space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state of Zheng. However, his love for evil and avoding good as well as always satisfying the personal desires to keep the royal family and its ralatives planted the bane of civil strife for the state of Zheng.

Key words: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historical narrative; historical enactment; Wujiang; Duke Zhuang
(责任编辑 魏晓虹 责任校对 魏晓虹)